

中国共产党的共同富裕思想与实践

赵学军 钟李隽仁

摘要：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在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系统的共同富裕思想。中国共产党的共同富裕思想的理论逻辑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奠定共同富裕的社会制度基础；实现工业化，奠定共同富裕的生产力基础；广大农村走集体经济的道路；城市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国营经济、集体经济；先富带动后富；兼顾效率与公平；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区域差距；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新中国在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实践中，历经曲折，取得了重大成就，也留下了深刻教训。这些都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 生产力 按劳分配

引言

“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财富的创造和分配，是各国都面对的重大问题（习近平，2022）。在漫长的历史实践中，一些国家生产力发达，但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两极分化严重。一些国家试图用超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福利制度解决社会问题，但因此而背负了沉重的财政负担。一些国家陷入了生产力水平有所提高，但没有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的“中等收入陷阱”。由此可见，做大财富“蛋糕”、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是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已奠定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制度基础。从农村集体经济建立到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从国营经济建立到国营企业经营体制改革，从单一社会主义公有制

[作者简介] 赵学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邮政编码：100836，电子信箱：zhao_xj@cass.org.cn；钟李隽仁，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102488。

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在不断探索做大社会财富“蛋糕”的路径。从初步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到构建多种形式的收入分配和福利制度，中国也在艰难探索如何完善公平合理分好社会财富“蛋糕”的分配制度。中国在共同富裕之路上不断前进。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有序推进，高质量发展释放新动能，全面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取得历史性成果，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共同富裕探索又迈向新征程。

共同富裕是学术界历久弥新的研究课题。近些年来，学者们对于当代中国共同富裕问题的讨论愈加热烈。黄群慧（2021）认为，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有着显著的不同。张旭、乔涵（2022）认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根据各个时期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形成了具有阶段性色彩的共同富裕思想，进行了有益的实践，成就巨大。张琦（2021）认为，中国共同富裕思想的演变历程，在公平与效率的理解方面，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高培勇（2022）认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必须准确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必须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还有一些学者回顾了中国共同富裕的历史实践。叶松、武力（2017）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打破了“大锅饭”和绝对平均主义的束缚，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开发利用人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创造出了惊人的财富。胡怀国（2022）认为，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开辟了一条中国的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互促进、现代化建设共同富裕内在互嵌的现代化道路。彭月英、李红雁（2005）认为，我国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改革和完善分配制度，否定平均主义，肯定按劳分配，从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发展到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保证了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总的来看，近年来学术界分析了共同富裕思想的发展脉络，探讨了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实践历程，特别关注了收入分配与共同富裕的内在联系，关注了现代化进程中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对于共同富裕问题的研究形成了不少成果。

笔者以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顾当代中国探索共同富裕的思想、实

践与经验教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要深入分析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的思想与实践，不能把研究共同富裕问题简单等同于研究收入分配问题，而是应该从制度基础、生产力发展、区域发展、城乡关系等宏观方面着眼，用整体性的思路研究中国共产党探索共同富裕的思想逻辑与实践逻辑。

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共同富裕思想与实践

在1949年到1978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了推进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整体发展思想，深刻改变了近代中国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面貌。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共同富裕思想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中国共产党人共同富裕思想的重要来源是马克思主义。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揭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是社会主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指出“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马克思，2004：743—744），认为“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马克思，2004：874），资本主义社会不可持续。马克思提出，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推翻引发贫困的落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为公平分配提供了保障，并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1980：222）强调，在未来的社会中，“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马克思、恩格斯（2001：411）指出，“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整体性的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逻辑：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奠定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实现工业化，奠定共同富裕的生产力基础；广大农村走集体经济的道路；城市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国营经济、集体经济；实

行按劳分配。

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的任务是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

共同富裕建立在坚实的生产力基础之上，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是工业化。毛泽东早在1944年5月就指出：“要使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需要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3：515）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以下称《宣传提纲》）明确提出，党和全国人民的基本任务是：由落后的贫穷的农业国家，变为富强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国家，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当时工业化概念近似于现代化概念，周恩来（1993：176、196—197）认为，现代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广大农村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走集体经济的道路。1955年10月，毛泽东指出，“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3：308）。1955年7月，毛泽东（1999：437）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提出，“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广大农民走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就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较快地共同富裕起来，毛泽东（1999：496）认为，“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

城市要实现共同富裕，就要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国营经济、集体经济。《宣传提纲》指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要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要扩大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合作社社员的集体所有制，把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改造为全民所有制，把手工业私人所有制改造为合作社社员的集体所有制。《宣传提纲》特别强调国营企业的重要作用，指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首先发展国营工业，并发展国营交通运输业、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

在分配制度方面，则要建立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制度。农村消灭剥削农民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城市消灭剥削工人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实现按劳分配。刘少奇（1985：303—304）认为，分配问题是解决共同富裕的关键。陈云（1995：254）指出，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同时要兼顾公平，他说要使人民“生活水平多数达到中等，少数可以先富起来”。

（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制度是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1952年底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是党的奋斗目标，1953年我国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定了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时，完善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些政治制度构建起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体系，为确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相应的经济制度提供了政治保障（《中国共产党简史》编写组，2021：179）。

当时理论界认为，单一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之后，我国实施了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所占的比重超过90%，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

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建立，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实现共同富裕从此有了坚实的社会制度基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三）大力发展生产力

建立共同富裕的生产力基础是实现工业化。中国的工业化起步很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工业基础薄弱，尚未形成工业体系。1949年，工农业总产值中机器大工业只占17%，农业和手工业还占83%（汪海波、刘立峰，2017：17、20）。

为了奠定共同富裕的生产力基础，“一五”时期，中国以苏联援助的“156项”建设项目为核心，以限额以上921个大中型建设项目为重点，掀起

了大规模工业化浪潮。1969年，“156项”建设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加上陆续投产的限额以上的建设项目，中国史无前例地发展出独立自主工业体系的雏形（赵学军，2021）。“二五”时期、“三五”时期、“四五”时期，中国持续推进工业化，优先发展重工业，逐步形成了相对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1982年4月2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宣告我国已经基本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为改革开放后的生产力的大发展积蓄了势能。经济发展模式完成了从农业主导向工业主导的跨越，为进一步实现共同富裕打下了坚实基础。

（四）发展公有制经济

为了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并发展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成为经济建设的方向。

在农村，引导农户组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走集体化之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土地改革，废除了农村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土地改革对推动农村共同富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土地改革没收了地主多余的土地，消灭了地主以土地参与分配且占据很大份额的分配制度，彻底铲除了造成农村人口贫富悬殊的根源。土地改革激发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1949年全国人均粮食产量为418斤，1953年上升到574斤（杜润生，1996：13）。为解决土地改革后农户经营规模小、缺乏生产工具、难以扩大再生产等缺陷，国家鼓励互助合作，引导、组织农户组建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走农业集体化道路。到1956年底，96.3%的农户加入合作社，占总农户数87.8%的农户加入高级社。到1957年末，全国高级社达75.3万个，入社农户比例达96%以上（《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1992：110）。随着土地及耕畜、大型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归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所有，广大农村建立起了集体所有制经济。在探索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的实践中，我国建立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但这种体制不合国情，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低下。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建立了合作医疗制度和五保供养制度，提升了农村医疗卫生水平，保障了贫困农户的基本生活。

在城市，建立与发展国营企业、集体企业。国营企业是全民所有制企业，

全民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要形式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从五个方面迅速建立了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一是发展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权创办的国营企业，使其成为新中国国营企业的组成部分。二是接管国民政府官僚资本企业，将其改造为新中国的国营企业。这些被接管改造的官僚资本企业，成为新生共和国国营企业的主体。国营企业掌握了全国电力产量的58%、原煤产量的68%、生铁产量的92%、钢产量的97%、水泥产量的68%、棉纱产量的53%，国营轮驳船载重量占全国的43%，国营公路汽车客运量占全国的52%（李定，1997：42）。三是接管在华外资企业，将其转变为新中国国营企业。四是改造私营工商业，将其转化为国营企业。五是“一五”时期，在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中建立新的国营企业。此后的计划经济时期，政府持续不断地新建、扩建国营企业，全民所有制企业实力越来越强。这一时期，我国国营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8%，工业产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在1952—1964年间为12.3%，在1965—1976年间为9.5%（杨琰，2019）。

建设国营企业的同时，政府大力发展集体企业。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另一种重要形式。我国的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是在20世纪50年代手工业合作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手工业合作化初创时期，生产合作社内部是合作关系，社员对合作社企业有控制权，“自愿结合、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城镇集体企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后来受“左”的思想影响，集体企业搞“一大二公”，城镇集体企业变成了“二国营”企业，劳动分红也随之取消，职工吃起了“大锅饭”（中国工业合作经济学会，2004：20）。国营企业与集体企业的建立，为城市居民提供了获得就业岗位与收入的渠道。

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按劳分配的收入分配制度。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按劳分配制度。1952年前后，全国进行了第一次工资改革，初步确立了国营企业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工资制度。职工收入呈现平均化趋势，形成了低水平的收入平等。如1957—1978年，国有企业从业人员年平均货币工资最高仅为661元，城镇集体单位为571元（国家统计局，1985：45—50）。在建立按劳分配工资福利制度的过程中，通过对私营工商业主的赎买政策，私营资本不再参与分配。

国营企业、集体企业还建立了职工福利制度。这种福利制度的特点是，依托单位，职工享有养老、住房、医疗及多种待遇综合福利。“保障方面，有保障地低价获取粮食和食品以及其他稀有商品。医疗方面，大约40%的综合医院床位在国有企业里。退休后的养老金和其他福利仍然可以照常享受。孩子的小学 and 中学教育得到保证，70%的国有企业开设有相应的学校。住房方面，由工作单位提供低成本住房。”（诺顿，2016：61）福利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为城市居民共同富裕提供了基础性保障。

这一时期，共同富裕的实践取得很大的成绩，整体上的贫富差距显著缩小。

总体收入分配差距不断下降。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从1953年的0.558下降至1964年的0.305。整个20世纪60年代，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在0.3左右，到了20世纪70年代，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下降至0.27左右（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2010：23—26）。

居民人均收入有所上涨。1949—1957年，居民人均年收入从66.1元增加到168元，年均增长达到12.37%，但在1957—1978年的20余年间，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仅由235.4元上涨到343.4元，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由72.9元上涨到133.6元（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2010：23—26），居民总体收入增长十分缓慢。

推进共同富裕的明显不足是城乡收入分配存在差距，且这一差距始终停留在较高水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城镇人均收入相当于农村的3.5倍，随后有所下降，但直到1978年，城乡收入比率都始终在2以上（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2010：23—26）。

这一时期，在思想认识层面，错误地将共同富裕等同于平均主义，强调绝对平均。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后，党内出现了将按劳分配原则及差别工资制等同于“资产阶级法权”的错误认识，主张搞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收入分配呈现平均化倾向，严重弱化和扭曲了激励机制，挫伤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导致产生了低水平的经济平等，收入增长缓慢。

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时期共同富裕的探索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1978—2012

年,为实现共同富裕,以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了大力发展生产力、“先富带动后富”、兼顾效率与公平、城乡与区域均衡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等共同富裕思想。在实践中,主要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鼓励一部分人先富、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解决城乡与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促进了人民的共同富裕。

(一)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共同富裕思想

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倡导“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

邓小平认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他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邓小平,1993:116)。他明确指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邓小平,1993:111)。“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1993:373)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能把贫穷当作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87:771—772)。

邓小平认为,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邓小平,1993:172)。《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也指出,“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最主要标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87:771—772)。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

邓小平提出,“先富带动后富”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路径,同时要避免两极分化。让一部分人和有条件的地区先富起来,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寻求共同富裕路径方面的重大创新。邓小平强调,“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邓小平,1993:166)。同时,他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邓小平,1993:110—111)。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

法经营先富起来”，“我们的分配政策，既要有利于善于经营的企业和诚实劳动的个人先富起来，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要防止贫富悬殊，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

20世纪90年代，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国内外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强调实现共同富裕必须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效率与公平要同时兼顾，城乡与区域要均衡发展，深化了中国共产党的共同富裕思想。

江泽民认为，要进一步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前提。他指出，“国家的昌盛，人民的富裕，说到底经济实力问题”（江泽民，2006：59）。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党的十五大报告再次强调，“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要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江泽民认为，要更好地兼顾公平与效率，不仅要做大“蛋糕”，更要分好“蛋糕”。江泽民强调，“贫富差距扩大不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江泽民，2006：543），他提出要注重“合理调节社会成员的收益分配，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江泽民，2006：25）。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既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党的十五大报告强调，“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江泽民认为，实现共同富裕，要注重区域协调发展。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强调，“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绝不能动摇”（江泽民，2006：466），强调要认真解决地区间的发展差距。1994年，国务院制定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解决了8000万农村人口的温饱问题。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将西部大开发战略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战略任务。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指出，“为了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国家对中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采取积极扶持的政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8：292）。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要“发挥各地优势，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进一步发展东部地区同中西部地区多种形式的联合和合作”，“从多方面努力，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江泽民还指出，实现共同富裕必须推进城乡的协调发展。

21世纪初期，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了科学

发展观,注重以人为本,更好地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的共同富裕思想。

胡锦涛指出,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不断做大共同富裕物质基础。胡锦涛说,“关键还是要靠发展”(胡锦涛,2005),“要通过科学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胡锦涛,2016:625)。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胡锦涛指出,要更好地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他说,“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9:30)。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胡锦涛指出,要进一步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要“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 and 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胡锦涛,2016:18)。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2004年到2012年连续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都聚焦于“三农”问题,强调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实现城市对农村带动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二) 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

实现共同富裕,必须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做大可分配的“蛋糕”。

一是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提高农村经济的效率。

人民公社体制是“大锅饭”体制,生产激励不足,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从安徽开始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给了农民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1984年,全国99%的生产队、96.6%的农户实行了“大包干”(芦千文、高鸣,2020)。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乡镇企业异军突起。1987年,乡镇企业第二、三产业产值合计4854亿元,相当于农业总产值的104%,邓小平称之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邓小平,1993:238)。乡镇企业有力地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为增加农民收入、实现脱贫致富打下了一定的基础。1986年,中央“一号文件”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逐渐打破了城乡隔离,户籍制度开始松动。城乡人口流动促

进了生产力发展，释放了人口红利。党的十四大后，城乡人口流动规模不断扩大，地区之间的要素流通不断加快（张海鹏，2019）。2006年起，我国废止农业税，为广大农民历史性地减轻了负担，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这一时期，农民收入不断提高、生活得到明显改善。有研究认为，1978—1985年是我国农民脱贫致富效果最为显著的一段时期（刘冬梅，2003：43）。邓小平谈到，“农村改革见效非常快，这是我们原来没有预想到的”（邓小平，1993：238）。

二是深化国营企业、集体企业经营体制改革，激发企业活力，增强企业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国营企业开始实行生产责任制。1985年，《国务院关于国营企业工资改革问题的通知》规定：“在国营大中型企业中实行职工工资总额同企业经济效益按比例浮动的办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1989：398）。政府通过实行政企分开、简政放权、企业自负盈亏、自主经营，寻求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效途径。国营企业经营体制改革，扩大了企业自主权，明显提高了企业劳动生产率，提升了企业的生产能力，创造出了更好的经济效益。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也增加了职工收入、福利待遇，改善了职工生活质量，进一步释放了生产力和发展动能。

三是培育多元化市场主体，共同创造社会财富。

计划经济时期实行单一公有制的所有制结构，脱离了我国的历史与国情。改革开放后，我国探索多种经济成分协调发展，积极培育多元化市场主体，共同创造社会财富，经济结构转变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格局。从经济总量来看，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不到1%上升到近年来的超过60%，成为促进我国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从吸纳就业来看，非公有制单位就业人数比重从1978年的0.2%上升至近年来的87.3%（高帆，2021）。非公有制企业逐渐成为我国吸纳就业的“主力军”。“到2019年底，我国已有市场主体1.23亿户，其中企业3858万户，个体工商户8261万户”（习近平，2020a：2）。其中，“8200多万个体工商户，带动就业人口超过2亿，是数量最多的市场主体，是群众生活最直接的服务者”（习近平，2020a：5）。“这些市场主体是我

国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者，在国家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习近平，2020a：2）市场主体成为社会财富的重要创造者。

（三）探索“先富带动后富”的共同富裕道路

设立经济特区，由沿海富裕地区引领全国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后，为充分发挥东部地区区位优势，国家先后设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经济特区，相继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经过多年发展，根据1999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估计，1997年上海实际人均GDP为14471美元，人类发展指数为0.877；北京实际人均GDP为9405美元，人类发展指数为0.867；广东省实际人均GDP为5860美元，人类发展指数为0.843；珠海、深圳、广州、佛山等市实际人均GDP分别为10545美元、9112美元、8925美元和7088美元（胡鞍钢，2001：19）。这表明东部沿海城市已属于中等收入或较高人类发展水平的地区，较快地完成了“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任务。

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起来之后，不断带动西部地区进一步发展，以实际行动履行“先富带动后富”的发展承诺。截至2009年底，东部地区到西部地区投资经营的企业累计近20万家，投资总额近3万亿元（蒙慧，2013）。

（四）协调城乡与区域平衡发展

第一，财政转移支付支持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展。2002年实行中央与地方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随着深化财税管理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健全了财政转移支付制度。2011年在中央预算10.22万亿元的总支出中，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达3.371万亿元，其中转移支付高达3.2万亿元，主要用于欠发达地区，而西部省份又是转移支付的重点，如西藏、青海等的中央转移支付均超过当地财政税收总盘子的5—10倍。分税制改革后的税收制度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在平衡区域财政、促进地方公共服务均等化，乃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调节作用（张兴军，2011）。

第二，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和西部大开发战略。为进一步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1994年国务院发布实施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动员

全党和全社会的力量，实施扶贫攻坚决战，在 20 世纪末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为进一步解决区域发展差异问题，1999 年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2006 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提出努力实现西部地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2012 年，国务院批复《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明确制定了西部地区经济增速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等七大目标，并提出支持成渝经济区等 11 个重点经济区率先发展。

在国家政策倾斜和大力投入下，我国贫困人口大幅下降。1978 年我国的农村贫困人口有 2.5 亿人，1993 年减少到 8000 万人，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从 30.7% 下降到 8.7%。区域间相对增长速度差距不断缩小，2007 年西部地区经济增速首次超过东部地区，2010 年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14.2%，分别比东部、中部及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1.8、0.5 和 1.1 个百分点，这意味着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追赶趋势发展良好，与东部地区相对差距开始有所缩小（蒙慧，2013）。城乡与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在发展中不断得到缓解。

（五）探索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

改革开放后，分配领域突破了单一的比较平均分配方式，转向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1979 年 9 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允许农村生产队包工到组，实行统一经营与核算下的按产量计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1a：162）。1980 年，国家允许农村可以同时存在多种经营形式、多种计酬办法。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推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之后，农户来自集体统一经营的收入所占份额在大幅度下降，从 1978 年的接近 70% 降至 1985 年的 10% 左右，而来自家庭经营收入的份额从 30% 上升至 80% 以上（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2010：23—26）。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形成了多元化的分配格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必须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计算报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1a：7）。党的十三大首次提出了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允许合法的非劳动收

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1b：28）。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确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并提出“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1c：465）。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明确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1d：21）。党的十六大又将管理纳入了可参与分配的生产要素之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5：12）。党的十七大强调，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9：30）。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允许非劳动要素按贡献参与收益分配，居民收入来源出现多样化，调动了一切生产要素参与经济建设的积极性，提高了经济增长率，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丰厚物质基础。

另外，妥善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强调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收入分配方面，过分强调平等，就会产生平均主义；过分强调效率，则会拉大收入差距。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更倾向于规范个人收入、注重调整区域收入，并强化社会公共投入，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保障。

（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渐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保障制度。1986年颁布的《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标志着我国正式建立待业保险制度。1991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标志着我国开始建立更为完善系统的养老保险制度。1995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走向深化。1998年，我国正式确定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框架。2007年，全国启动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覆盖城乡居民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逐步建立与完善。2008年，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方案》，2009年，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覆盖城乡居民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逐步健全。截

至2012年，享受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口已超过12亿。实施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制度，给予住房困难的低保家庭安居之所。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为实现共同富裕筑牢了坚实底线。

（七）实现共同富裕的成就与不足

改革开放初期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实现了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城乡收入差距的目标。城乡人均收入比率从1979年的2.53下降至1983年的1.82。1978—1984年，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从133.6元上涨到355元，六年同比增幅达16.17%（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2010：23—26），且农村居民增收幅度超过了城市居民。党的一系列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收入差距和城乡差距。

但是，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发展，收入分配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又在扩大。首先，从总体收入分配差距来看，1985—2008年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快速上升，从0.29上升至0.49。自2000年开始，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警戒线0.4，此后一直处于高位徘徊状态。城乡收入差距以2007年为分水岭，此前城乡人均收入比率波动上升，达到3.14，此后开始逐渐下降（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2010：23—26）。其次，从城镇内部收入分配差距来看，2000年之前，城镇收入最高20%人群所占收入份额持续上升，从改革开放初期的30%上升到40%。与此相反，同一时期的城镇收入最低20%人群收入份额持续下降，从12%下降至不足8%（罗楚亮，2020）。城镇内部收入分配的“马太效应”逐渐显现，财富向城镇收入头部分额居民集中的趋势愈加明显。再次，从农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来看，农村收入最高20%人群所占收入份额从1980年的35%上升至2000年的45%，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份额持续下降。虽然近年来这种下降倾向有所减缓，但农村内部收入分配向头部聚集的趋势仍然显著。最后，从区域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来看，人均收入的地区差距明显扩大，农村人均收入的地区差距要高于城镇。改革开放以来，两者之间的差距表现得更明显，城镇人均收入地区差距表现出扩大倾向。得益于党和政府一系列惠农政策，农村人均收入地区差距在2005年左右出现了较大幅度缩小（罗楚亮，2020）。

这一时期的实践表明：一方面，市场化能够最大限度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做大社会财富“蛋糕”；另一方面，市场化不会自

动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收入分配差距和区域差距存在扩大的趋势，需要政府动用“有形的手”分好“蛋糕”，完善收入分配机制，缩小市场化造成的收入过大差距。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探索

2012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习近平指出，“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习近平，2018：4）。在探索共同富裕方面，主要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以全面脱贫攻坚推动共同富裕、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

（一）习近平的共同富裕思想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推动脱贫攻坚，实现全面小康，把“人民至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提出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进一步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共同富裕思想。

习近平提出，要坚持把“人民至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习近平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习近平，2020b）。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习近平提出，要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要坚持以全面脱贫攻坚推动共同富裕。习近平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习近平，2020c）。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入开展脱贫攻坚，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二）健全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制度

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将“知识”作为生产要素纳入可参与分配的要素范围，并作出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深刻定位。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完善市场评价要素贡献并按贡献分配的机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按市场贡献决定要素报酬，这是我国在改革实践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成果（李国镇、胡怀国，2022）。同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数据”增列为参与分配的生产要素，进一步激发了市场主体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有利于公平释放各类要素潜力，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三）坚持以全面脱贫攻坚推动共同富裕

我国以全面脱贫攻坚推动共同富裕。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脱贫攻坚战略取得了历史性成就。2020年底，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改革开放以来，按照现行贫困标准计算，7.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习近平，2021a）。党带领人民推动全面脱贫攻坚取得消除绝对贫困的胜利，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取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经济实力大幅跃升。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和人民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习近平，2021b）

乡村振兴战略不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2012年，我国城乡收入比为3.1，2017年下降至2.7。2017年，农村人均纯收入增加到13432元，五年来增幅达69%（何爱平、李清华，2019）。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得到明显提升，与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逐渐缩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已是我国在新发展阶段促进城乡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叶兴庆, 2018)。

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2014: 28)。2020年,我国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人数达到13.6亿人,城乡低保对象共有4427万人。截至2021年4月,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达到100961万人(张远新, 2021)。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对逐步缩小贫富差距,发挥了兜底性和保障性作用。

(四) 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五大新发展理念,成为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理念。首先,坚持创新发展,把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指出,我国在全球创新指数榜单中列第14位(《经济导刊》编辑部, 2020)。不断跃升的创新能力为共同富裕铸就了强大动能,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内生动力。其次,坚持共享发展,以人民为中心,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党的十八大强调“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的收入分配政策,并提出要“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2014: 28)。2014年,对长期存在的央企、国企高管畸高薪资明确设置上限。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党和政府的一系列举措,使人民群众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安全感与幸福感。最后,坚持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形成“新型工农、城乡关系”。2017年,党的十九大指出,“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尽快加以解决。我国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城乡共同富裕。我国坚决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为共同富裕筑牢环保底线。我国坚持开放发展,积极构建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实现共同富裕增强海内外发展动能。

(五) 共同富裕取得新成就

居民人均收入增速基本实现与经济增长同步。2014—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收入增速始终保持在6%以上,基本实现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劳动报酬

份额由2012年的47.66%增至2017年的51.75%。收入分配差距总体呈现下降趋势，收入分配失衡状况得到一定的缓解，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自2012年起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刘儒，李超阳，2020）。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共同富裕，立足以人民为中心，围绕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共同富裕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共同富裕的探索正昂首阔步迈向新征程。

四、当代中国探索共同富裕的历史经验

（一）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习近平，2017）。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人民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的政治基础和思想共识。毛泽东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毛泽东，1991：1098）。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核心领导力量。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能够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攻坚克难、胜利前进。

（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保证

中国近代史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当代中国经济建设史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因为社会主义克服了资本主义的固有弊端，抛弃了“资本至上”的逻辑，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观，从而使共同富裕成为可能。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不断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全党同志必须牢记，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容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下去”（习近平，2018：35—36）。

毛泽东指出，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是我国走向富强的保障。他说，“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毛泽东，1999：495）。邓小平强调，“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

两极分化”（邓小平，1993：149）。习近平指出，“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化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18：5）。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协调发展，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能够保障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

（三）以人民为中心是推动共同富裕的价值遵循

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习近平强调，“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习近平，2021b）。从毛泽东思想中的“群众路线”，到邓小平理论中的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概括，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要求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到科学发展观中的核心以人为本，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方略，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遵循。共同富裕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只要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就能实现共同富裕。

（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物质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从1978年到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3678亿元增加到1015986亿元左右，年均增速超过9%，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从1.8%上升到17%左右，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国工业增加值从1622亿元增加到313071亿元左右，是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全国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71元增加到32189元左右，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世界瞩目（郝飞飞、任霏、刘欢，2022）。历史经验表明，分好社会财富“蛋糕”的前提是要做大“蛋糕”，只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奠定实现共同富裕的雄厚物质基础。

（五）效率与公平相统一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强调，要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正确处理增长和分配关系，把“蛋糕”切好分好（习近平，2022）。历史证明，能否很好地协调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事关我国的改革、发

展和稳定的大局。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阶段，效率和公平都要兼顾，在再分配环节，应该更加注重公平，而在三次分配环节，要在自愿的原则下兼顾公平。兼顾效率与公平，既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又能促进公平分配，达到共同富裕，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六）在富裕的基础上共富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这就要求我们要落实“先富带动后富”，在富裕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习近平认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东部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了，不能不管其他地方，要共同富裕”（新华社，2017）。先富带动后富，是党在历史阶段中不断形成的战略决策，能够最大程度实现社会财富的总体增长，同时兼顾效率与公平，实现共同富裕。历史经验表明，在富裕的基础上推动先富带动后富，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能够解放生产力，提升社会财富总量，同时在合理分配制度的保障下，避免因为平均主义带来生产激励不足、收入增长缓慢问题。

（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习近平强调，“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21）。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志性工程，组织推进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启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农村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2021c：462）。乡村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短板，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区域均衡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八）融入全球价值链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外在条件

当前，全球化虽然出现逆流，但仍然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和基本趋势。在全球化过程中，“世界人民的普遍交往，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与共同进步，把人类凝聚成一个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李包庚，2020）。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参与经济全球化，积极承担国际产业分工，日益融入了全球价值链。全球性浪潮为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带来了良好的机

遇,我国利用国内国外市场与资源,实现了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见,融入全球价值链助推我国经济成长,有利于奠定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五、当代中国探索共同富裕的教训

(一) 共同富裕不等于平均主义

我国曾出现过把实现共同富裕等同于搞平均主义的错误认识,在分配方面实行“大锅饭”,最终导致激励不足,从而生产效率低下。我们要深刻认识将共同富裕等同于平均主义的历史教训。《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平均主义思想是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的一个严重障碍,平均主义的泛滥必然破坏社会生产力”(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86:578)。邓小平强调,“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邓小平,1993:155)。历史教训警醒我们,共同富裕不等于平均主义。要在发展生产力和合理分配的基础上,分步实现共同富裕。

要不断完善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习近平指出,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习近平,2021d)。实践证明,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能够鼓励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也能够防止两极分化。同时,为了改进因市场竞争导致的贫富差距过大问题,要完善三次分配制度。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的比重,加大二次分配中再分配政策的收入调节力度,鼓励第三次分配,发挥其补充作用,让人民切实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

(二) 不能超越历史阶段推行单一社会主义公有制

社会主义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制度基础。作为社会主义最基本的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保障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我国在探索社会主义

基本经济制度历程中，受理论与历史的局限性，曾经将单一公有制当作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建立了相对单一的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公有制经济。相对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结构，为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打下了基础。在政府主导下，集中资源推进工业化，建立起了相对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张乾元，2009）。然而，单一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管理僵化，对企业和劳动者缺乏激励机制，严重影响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生产效率低下，不利于创造社会财富。实行单一公有制超越了历史阶段。

改革开放后，我国探索到了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提供了保障。实践证明，实现共同富裕，必须不断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实践证明，公有制经济固守着国家的经济命脉，维护着国计民生，保障着国家的经济安全，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中坚力量；非公有制经济在繁荣经济、促进增长、推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政策，就能调动各方力量，促进经济发展，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三）不能实行分割性、歧视性的公共服务政策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经济体制，实行城乡不同的公共服务政策，农村居民没有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福利。这种分割性、歧视性的公共服务政策不利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不利于农村人口共享发展成果，不利于农业和农村进一步吸引人才、留住人才，限制了生产力在农村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其历史教训。目前，农村仍然是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薄弱环节，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农村居民在资源的获取和享有等方面存在较大短板（陆杰华等，2021）。

实现共同富裕，要不断完善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从低水平、广覆盖的公共服务模式，转向高质量、同质化的公共服务模式。只有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均等化建设，才能建立和不断完善城乡、地区融合发展的区域发展体系，才能真正缩小区域间、群体间的发展差异，为实现共同富裕总目标筑牢发展基础。

参考文献：

-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1992，《当代中国的农业》，当代中国出版社。
- 《经济导刊》编辑部，2020，《中国创新能力排名保持全球第14位》，《经济导刊》第9期。
- 《中国共产党简史》编写组编著，2021，《中国共产党简史》，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 陈云，1995，《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
- 邓小平，199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
- 杜润生主编，1996，《中国的土地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
- 高帆，2021，《新型政府—市场关系与中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机制》，《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
- 高培勇，2022，《促进共同富裕要力求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人民政协报》3月8日。
- 国家统计局编，1985，《中国统计年鉴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
-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2010，《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
- 郝飞飞、任霏、刘欢，2022，《中国共产党推进共同富裕的百年历程、主要成就及基本经验》，《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 何爱平、李清华，2019，《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历史变迁与未来展望》，《经济纵横》第10期。
- 胡鞍钢主编，2001，《地区与发展：西部开发新战略》，中国计划出版社。
- 胡怀国，2022，《现代化视域下的共同富裕：理论逻辑与物质基础》，《学术研究》第4期。
- 胡锦涛，2005，《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光明日报》6月27日。
- 胡锦涛，2016，《胡锦涛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
- 黄群慧，2021，《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光明日报》9月7日。
- 江泽民，2006，《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
- 李包庚，2020，《世界普遍交往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 李定主编，1997，《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当代中国出版社。
- 李国镇、胡怀国，2022，《共同富裕与基本经济制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湖北社会科学》第1期。
- 刘冬梅，2003，《中国农村反贫困与政府干预》，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 刘儒、李超阳，2020，《新中国成立以来收入分配政策的历史变迁与基本经验》，《当代经济研究》第4期。

- 刘少奇, 1985, 《刘少奇选集》(下), 人民出版社。
- 芦千文、高鸣, 2020, 《中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支持政策的演变轨迹、框架与调整思路》,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 陆杰华等, 2021, 《新时代农村养老制度设计: 历史脉络、现实困境与发展路径》,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 罗楚亮, 2020, 《收入结构与居民收入差距变动——新中国成立以来收入差距的基本特征》,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 马克思, 2004, 《资本论》第1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 198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 200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人民出版社。
- 毛泽东, 1991, 《毛泽东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
- 毛泽东, 1999, 《毛泽东文集》第6卷, 人民出版社。
- 蒙慧, 2013, 《从“先富”带动“后富”角度解析区域共同富裕困境》,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 诺顿, 巴里, 2016, 《中国经济: 转型与增长》, 安佳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彭月英、李红雁, 2005, 《分配制度改革与共同富裕目标实现路径》, 《求索》第9期。
- 汪海波、刘立峰, 2017, 《新中国工业经济史》, 经济管理出版社。
- 习近平, 2017,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人民日报》10月28日。
- 习近平, 201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 外文出版社。
- 习近平, 2020a, 《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人民出版社。
- 习近平, 2020b,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 《人民日报》11月4日。
- 习近平, 2020c, 《向“摆脱贫困与政党的责任”国际理论研讨会致贺信》, 《人民日报》10月13日。
- 习近平, 2021a, 《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2月26日。
- 习近平, 2021b,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7月2日。
- 习近平, 2021c, 《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中央文献出版社。
- 习近平, 2021d,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求是》第20期。
- 习近平, 2022, 《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求是》第10期。

- 新华社, 2017, 《习近平总书记的扶贫情结》, 《人民日报》2月24日。
- 杨琰, 2019, 《新中国工业体系的创立、发展及其历史贡献》,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第8期。
- 叶松、武力, 2017, 《从按劳分配到共同富裕——新中国居民收入的历史演变》, 《百年潮》第9期。
- 叶兴庆, 2018, 《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论纲》, 《改革》第1期。
- 张海鹏, 2019, 《中国城乡关系演变70年: 从分割到融合》, 《中国农村经济》第3期。
- 张琦, 2021, 《传承中发展的共同富裕思想》, 《群言》第5期。
- 张乾元, 2009, 《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及其意义》,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第11期。
- 张兴军, 2011, 《通往平衡之路》, 《中国经济信息》第8期。
- 张旭、乔涵, 2022, 《中国共产党人共同富裕思想发展的历程与实践》, 《山东社会科学》第4期。
- 张远新, 2021, 《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裕的百年追求》, 《人民论坛》第32期。
- 赵学军, 2021, 《“156项”建设项目对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贡献》, 《中国经济史研究》第4期。
-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2018,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 中央文献出版社。
-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2021,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大事记》, 《人民日报》7月30日。
-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1989, 《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5—1987.12)》, 人民出版社。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1986,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 人民出版社。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1987,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下), 人民出版社。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1993,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1998, 《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重要文献选编》(下), 中央文献出版社。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2005,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中央文献出版社。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2009,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中央文献出版社。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2011a,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中央文献出版社。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2011b,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中央文献出版社。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2011c,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中央文献出版社。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2011d,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中央文献出版社。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2013,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 中央文献出版社。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2014,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中央文献出版社。
- 中国工业合作经济学会编, 2004, 《城镇集体经济深化改革研究——中国工业合作经济学会

2004 年年会论文集》。

周恩来, 1993, 《周恩来经济文选》, 中央文献出版社。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Conception and Practice of Common Prosperity

Zhao Xuejun^a and Zhong Lijunren^b

(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a;

School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

Abstract: It is a centurial pursui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elaborated the Marxist theory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developed a systematic concep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through its practice to achieve it. The logic of this conception is: to establish the socialist system as the institutional basis of common prosperity; to foster industrialization as the productivity basis of common prosperity; to develop collective economy in the vast rural areas; to develop state-operated economy and collective economy under socialist public ownership in urban areas; to let “some who get rich first pull up others and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to balance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to encourage urban and rural co-development; to reduce regional disparity; to uphold an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under which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work is the mainstay. During its explor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ent through twists and turns. It has achieved great accomplishments and also learned profound lessons, all of which will be informative and instructive for the further journey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ommon Prosperity, Socialism, Productivity,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Work

JEL Classification: B24, I31, N95, P21

(责任编辑: 王姣娜)